

韋莊集校注

〔唐〕韋莊撰
李 誼校注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唐〕韋莊撰
李誼校注

韋莊集校注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封面题字：繆 鉞

责任编辑：李嘉璋

封面设计：劉長久

韋 莊 集 校 注

〔唐〕韋 莊撰 李 誼校注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書店發行 四川日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23.75 字數：610千

1986年第1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冊

書號：1031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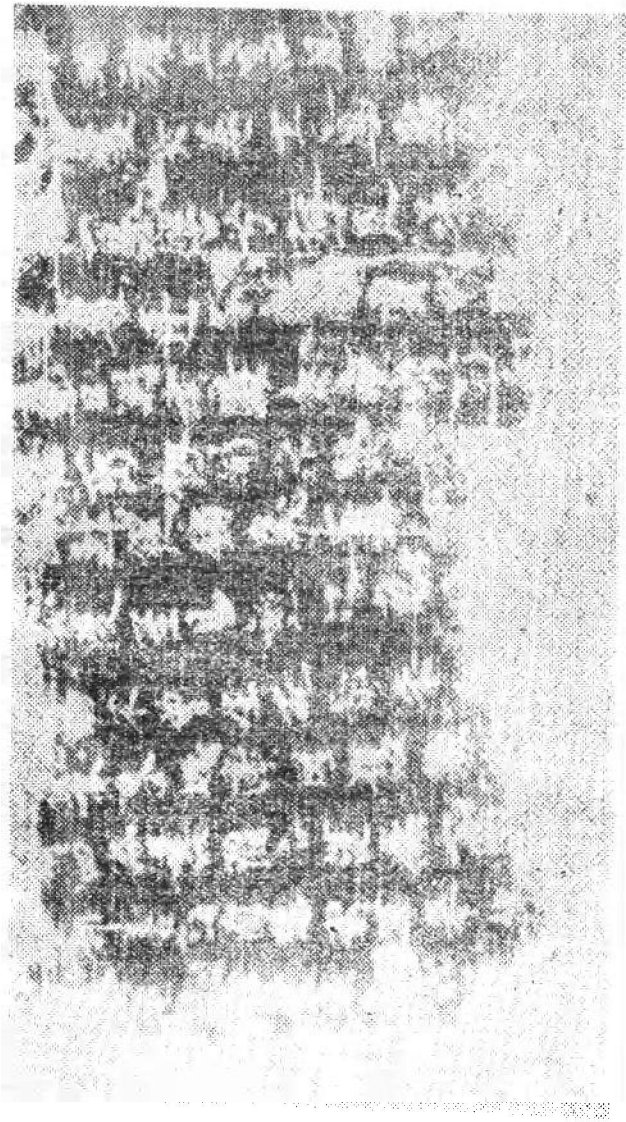
定價：4.80元

韋莊浣花集序

余家之兄莊自庚子亂離前凡著歌詩文章數十通屬兵火迭興簡編俱墜唯餘口誦者所存無幾爾後流離漂泛寓目綠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製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愁之文一詠一觴之作迄於癸亥歲又綴僅千餘首庚申夏自中諫□□□辛酉春應聘爲西蜀奏記明年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雖

蕪沒已久而柱砥猶存因命芟夷結茅爲一室
蓋欲思其人而成其處非敢廣其基構耳謫便
因閒日錄兄之藁草中或默記於吟詠者次爲
□□□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義也餘
今之所製則俟爲別錄用繼於右時癸亥年六
月九日謫集

綠君亭本《浣花集序》（藏北京圖書館）



《秦妇吟》敦煌写本残卷

前 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韦庄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他不仅是唐末五代成就突出的诗人，而且是颇负盛名的词家。他同花间词派“鼻祖”温庭筠齐名，故“世以温韦并称”（顾宪融《词论》）。

韦庄一生，先逢黄巢农民大起义，后遭藩镇军阀大混战，是在“海为深谷岸为蹊”（《赠云阳县裴明府》）的剧烈政治动乱中度过的。他长期颠沛流离，饱经忧患，仕途坎坷，郁不得志；后虽“晚达”，却为时甚短。正是由于这种不幸际遇，才使他接触到一些社会现实，受到不少磨炼，并且接近了人民，从而情有所感，发而为诗，写出了不少忧国忧民、感世伤时的优秀篇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突出矛盾、伤乱现实以及民间疾苦。加之，韦庄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忠于事实，注重感情，刻意求工的严肃态度，所以他的作品朴素平直，情深句秀，格调新颖，脍炙人口，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是初唐宰相韦待价裔孙。韦氏一家，在隋末唐初是世家大族，出了几个风云一时的人物，曾显赫一时，深得李唐王朝的宠重。但是到了韦庄出世的晚唐，这个家族业已衰败没落。韦庄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卒于蜀高祖武成三年（公元910年），终

年七十五岁。他主要生活在晚唐的宣、懿、僖、昭四朝及五代初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由衰微灭亡，并进入五代十国分裂紊乱的时代。这时统治集团内部朋比结党，互相倾轧，而最高当权者又外制于强藩，内牵于阉寺，以至朝政腐败，危机四起，兵连祸接，民不聊生。生于其时、年纪尚轻的韦庄，当然无例外地要受到乱世的影响。他幼住长安，继侨下邳，又寓郾、虢，频繁迁居，不但功名前途杳茫，而且生活也很贫困。据史书记载：“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称薪而爨”

（《太平广记》卷一六五）；他“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唐才子传·韦庄）。韦庄自己也曾承认：“性为无机率，家因守道贫。”（《曲江作》）尽管他处境艰难，生计窘迫，但他仍然有志于功名事业，并希望在乱世中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匡扶社稷的抱负。韦庄在自己的诗中，就明白表示过这种愿望：“平生志在匡尧舜”（《关河道中》）、“有心重筑太平基”（《长年》）。他还力图通过应举的办法，获得官职，来实现政治理想。韦庄虽然年轻时就富于文学才华，他“幼能诗，以艳语见长”（《十国春秋·韦庄传》），然而由于权贵把持朝政，垄断仕途，无人援引，他曾应举进士达四、五次之多，终因“要路无媒”（《下第题青龙寺僧房》），均不及第，得到的结果竟是：

“帝里无人久滞淹，别家三度见新蟾”（《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十二韵》）、“皆乘骏马先归去，独被羸童笑晚眠”

（《癸丑下第寄新先辈》）。这说明当时韦庄纵然有满腔报国热情和出众的济世才能，企图通过应举获得一官半职以实现其理想，真是谈何容易！特别是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他四十五岁时再至长安应举，适值黄巢攻破京都，韦庄陷于兵火，一度弟妹失散，自己又身患重病，差点在此死掉。这正如他在自己诗中所说：“与君同卧疾，独我渐弥留。弟妹不知处，兵戈殊未休。”（《贼中与肖韦二秀才同卧重疾二君寻愈余独加焉恍惚之

中因有题》)由此可见,韦庄的仕途是多么崎岖坎坷!

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韦庄由于阶级偏见,举家逃离黄巢起义军占领的长安,他经陕州,客洛阳,然后流寓江南。为了求食、求仕和求生,韦庄曾南抵镇江、东阳,西到三衢、两湖,行程万里以上,遍迹大江南北。他这次江南之行,始于唐僖宗中和二年,终于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历时十几年的漫长岁月,一直是在艰险的生活道路上奔波,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挣扎。韦庄在离乱漂泊中的种种艰辛,在客居穷困中的忧愁痛苦,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所谓“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关河道中》)和“多病似逢秦氏药,久贫如得顾家金”(《寄湖州舍弟》)等诗句,正是他流离颠沛、贫病交加生活的写照。

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韦庄五十九岁获“苏俭榜进士,释褐校书郎”(《唐才子传·韦庄》)之后,才结束了他长期流离漂泊的生活。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他六十一岁,被辟为判官奉使入蜀;归朝后升任左补阙,曾奏请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六十六岁,在西蜀为王建掌书记,自此终身仕蜀。天祐三年(公元906年)七十一岁,为安抚副使。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七十二岁,他助王建称帝,建立前蜀割据政权后,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制定“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蜀梼杌》卷上)。蜀高祖武成元年(公元908年),为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公元910年)八月,七十五岁的韦庄卒于成都花林坊,葬于白沙(今四川省灌县境)之阳,谥曰文靖。这说明韦庄显达的时间并不长,在前蜀这个割据小朝廷中做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不过三年左右而已。

韦庄的一生,可说是艰难曲折而又不断奋斗挣扎的一生。他虽出身世家大族,却长于乱世之秋。韦庄家道中落,自幼贫困,仕途艰虞,屡试不第。为了逃避战乱,他长期流亡,浪迹江湖,

不仅虚耗了宝贵的年华，而且也饱尝了乱离的痛苦。正因为频繁的战乱，把他卷入了社会的底层，使他与难民为伍，同贫士、山僧相交，所以才有可能熟悉当时的社会疮痍，了解动乱中人民的疾苦。虽然韦庄晚年出任宰相，为“晚唐诗人之显者”（《诗薮·杂编》卷四），但他对社会弊病仍然采取“直言无隐”（《十国春秋·韦庄传》）的态度，对人民痛苦也寄予同情与关心。他为王建掌书记时，在弹劾一县令乘时扰民所拟的草牒中说：“正当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唐诗纪事·韦庄》）竟成为流行一时的佳话和广泛传诵的名言。故史家称颂他“不恃权，不行私，惟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蜀梲杙》卷上）韦庄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和几十年的亲身感受，就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还须要特别指出的是，韦庄的文学创作还受到杜甫、白居易等前辈诗人的影响。我们都知道，韦庄比杜甫要晚出世一百多年，可是他们在政治思想、仕途活动以及一生际遇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韦庄同杜甫一样，忧国忧民，伤时感世，都是唐王朝的忠实维护者。他反对黄巢起义同杜甫反对“安史之乱”，虽然客观效果殊异，然而他们的主观愿望都是出于“忠君”或爱国，在这一点上两位诗人却又相同。而作为晚辈的韦庄，对杜甫则始终是推崇备至，仰慕不已的。他曾把杜诗列为自己所编《又玄集》一百五十名唐代诗人作品的首位。韦庄也象杜甫生前自称“杜陵野客”一样，常以“杜陵归客”（《章江作》）自居。他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六十七岁时，在成都“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韦蔼《浣花集序》），并寓居于此，直到离开人世。为了表示对杜甫的由衷景仰，还把自己的诗作“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浣花集序》）甚至在临终之时，韦庄仍念念不忘杜甫的诗篇，“后（庄）诵子美诗：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吟讽不辍。”（《唐诗纪事·韦庄》）这都说明韦庄所以能写出不少忧国伤时的诗篇和大量笔调清新的作品，同他对杜甫怀有特殊感情并把杜甫及其诗歌作为自己的楷模，是分不开的。所以，清代诗论家余成教认为：韦庄“《忆昔》、《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题姑苏凌处士庄》……诸诗，感时伤旧，颇似老杜笔力。”（《石园诗话》卷二）至于白居易对韦庄的影响，也是明显的。韦庄幼年侨居的下邳县，就是白居易的故乡。“居易此时尚健在，端已为诗学居易，固由身世近似，幼时环境感染，或亦其一因也。”（夏承焘《韦庄年谱》）因此，韦庄诗的风格与白居易的诗有颇多相象之处，以至后人在编辑他们的作品时，还发生混淆作者的情况。韦庄的《秦妇吟》长达238句，1666字，是唐代古诗中最长的一首。其内容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但它在叙事、布局以及声韵等方面，却酷似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而其题材独特，内容生动和沈郁顿挫等，似乎还略胜一筹。可见，韦庄在学习他的前辈诗人是极其认真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总之，韦庄自身曲折的生活经历、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前辈诗人的影响以及对其诗作的借鉴等等，都是他从事文学创作并能写出优秀作品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二）

韦庄的诗，流传至今者尚不足原作的三分之一。四部丛刊影印明人朱承爵刻本《浣花集》，编为十卷，诗二百四十九首（其中卷一虽标为四十八首，实为四十五首，向迪琮所校《韦庄集》亦从其数，乃虚增三首，现已除去。）、补遗二首，计二百五十一首，《全唐诗》补六十八首（本为七十首，有两首与朱本重复，亦予减出。），此次校注，又另补四首（据贯休《禅月集》、

《永乐大典》、《金陵梵刹志》以及敦煌写本各一首）及残句数联，合计三百二十三首。而韦庄自己在《乞彩牋歌》中说：“我有歌诗一千首”，可知其散佚不少矣。尽管他传下的诗作数量并不多，但它仍然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这些诗篇的思想内容和写作动机，他的弟弟韦蔼曾作过恰当的概括。他说：韦庄之诗，系“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四愁九愁之文，一咏一觞之作。”（《浣花集序》）这就说明韦庄的诗，不是无病呻吟，除极少数逢场作戏的应酬之作外，绝大部分作品确实都是寓目缘情，因事而发，同当时的现实生活相紧密联系的。

韦庄的诗，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众所周知，“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早已开始了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特别到了晚唐，宦官专权，朋党斗争，政治腐败，尤其作为最高当权者的皇帝，更是奢靡无度，为所欲为。他们沉湎于声色犬马，根本不问朝政大事。比如唐懿宗就极其荒淫残暴，他“好音乐宴游，……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他为了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曾“广造浮屠、宝帐、香辇、幡花、幡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又如唐僖宗以昏童继位，当皇帝时才十二岁，他“专事游戏，政事一委（宦官田）令孜。……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库空竭。”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正是由于他们骄奢淫欲，享乐腐化，不顾人民死活，才直接导致了唐末农民大起义，使唐王朝岌岌可危，政权摇摇欲坠。韦庄面对统治阶级行将灭亡的现实，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对他们穷奢极欲的罪行进行了无情揭露。他在《咸通》诗中说：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

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
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
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

唐代的统治阶级，似乎早就知道要天下大乱和大祸临头，所以在咸通时代就匆匆忙忙与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他们为“竞留天上乐”和“争买洞中花”，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诗人在这里依据历史事实，不仅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当时社会弊病的癥结——奢，而且其矛头所向，直指最高统治者的懿宗皇帝，这当然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又如《寓言》诗：

黄金日日销还铸，仙桂年年折又生。
兔走乌飞如未息，路尘终见泰山平。

韦庄以富于哲理的诗句和语言，斥责了统治者的挥霍无度和穷奢极侈。他还用兔、乌不息，泰山变平的深刻道理，预示统治阶级的肆意骄奢，必将无法摆脱其灭亡的命运。再看《观猎》诗：

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
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
鹞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
直到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

韦庄在这里既描绘了公子、将军游猎并获得了不少飞禽走兽的盛大场面，又点出了他们“喜逢朝罢”，无心朝事和恣意玩乐的事实，这同样是对统治集团腐朽奢靡的指斥和讽刺。

韦庄还在《惜春》里嘲讽了统治阶级一味追求享乐，而不居安思危；在《延兴门外作》中，斥责了王孙公子和豪贵美人的狎戏与游玩；在《贵公子》、《南邻公子》以及《少年行》诸篇里，谴责了统治阶级的空虚无聊和肆意游乐。诗人的这类作品，在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暴露晚唐的黑暗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因而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韦庄的诗，谴责了藩镇军阀的分裂割据。藩镇割据，在唐代历史上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唐代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大地主集团不断壮大的产物。藩镇军阀出现于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发展于肃宗、代宗之交，酿成大祸则是唐末、五代。到了晚唐之世，由于皇帝“常恐生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藩镇军阀因此更加恶性地膨胀起来。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旧唐书·李怀仙传》），其“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

（《新唐书·方镇表序》）。这样一来，使唐朝中央政权“一失其势，横流莫救，地分于群盗，身播于九夷”（《旧唐书·田承嗣传》），最后终于导致大唐帝国的分裂瓦解。唐代不少著名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对藩镇势力分裂割据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斥责。面临藩镇军阀不断坐大和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现实，韦庄也写了不少诗篇对他们给予了无情的谴责。比如《喻东军》：

四年龙驭守峨嵋，铁马西来步步迟。
五运未教移汉鼎，六韬何必待秦师。
几时鸾凤归丹阙，到处乌鸢从白旗。
独把一樽和泪酒，隔云遥奠武侯祠。

这是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亡成都之后，当时拥有重兵的武宁节度使时溥声称，“又令别将帅军三千赴难京师”（《旧唐书·时溥传》），而僖宗因以武宁节度使命之。其实他们久屯洛阳，根本未至京师，所以在诗里韦庄一方面对时溥等藩镇军阀心怀鬼胎，不进关镇压农民起义表示不满，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取的；另方面也表现了对藩镇势力壮大及其对时局严重影响的忧虑，因而严厉指斥他们：“铁马西来步步迟”、“六韬何必待秦师”以及“止竟有征须有战，洛阳何用久屯军？！”（《赠戍军》）又如《观浙西府相畋游》：

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
紫袍日照金鹅斗，红旆风吹画虎狞。
带箭彩禽云外落，避鹄寒兔月中惊。
归来一路笙歌满，更有仙娥载酒迎。

这是诗人为嘲讽独霸一方，骄横跋扈的周宝而作的，他当时以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镇润州。诗中生动地刻画出他拥兵作乐，奢侈畋猎，野心勃勃的丑恶嘴脸。这同杜甫在讽谕东川留后、梓州刺史章彝不顾家国安危，进行“夜发猛士三千人”的游猎“豪举”而作的《冬狩行》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

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
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
绣户夜攒红烛市，舞衣晴曳碧天霞。
却愁宴罢青蛾散，扬子江头月半斜。

这是韦庄以自己所见所闻备写周宝（金陵府相即是周宝）的豪华奢侈和歌舞酒色的腐朽生活。其意境与杜甫“似谏似讽”的名篇《赠花卿》，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它们都是为讽刺藩镇割据势力这个相同目的而作的。

藩镇军阀之间还经常发生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据史书记载：昭宗景福年间，“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资治通鉴》卷二五九）韦庄的《过扬州》诗就反映了这一事实：

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
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
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
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

诗人把扬州昔日的繁华同眼前的残破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并

以淮王升仙与炀帝无道，比喻藩镇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祸害和给扬州造成的破坏，这就使诗的寓意愈加深刻，谴责之义也更突出。显然，韦庄对藩镇割据势力这种鲜明立场，是符合人民的意愿，因而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韦庄的诗，反映了晚唐社会的衰微破败。唐王朝进入晚唐时期，经济残破，民生凋敝，社会矛盾突出，战乱经久不息，在各方面都出现衰败的景象。韦庄在比较多的篇什里，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感情。比如《长安旧里》：

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

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

诗人在这里虽然说的是旧居的残破：满目春草，车马迹灭，玉楼难寻，令人伤心；其实是对整个晚唐社会破败的形象刻画和唐王朝风雨飘摇的生动描绘。《过旧宅》诗也是如此：

华轩不见马萧萧，廷尉门人久寂寥。

朱槛翠楼为卜肆，玉栏仙杏作春樵。

墙前雨落鸳鸯瓦，竹里苔封蟋蟀桥。

莫问此中销歇事，娟娟红泪泣芭蕉。

韦庄在此所写，当然不仅仅在于华轩不见，门人寂寥，翠楼改成卜肆，仙杏已作春樵之类的旧宅荒凉的表面现象，而是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暗示了唐王朝这座封建大厦已是柱斜梁歪，破屋颓垣，即将崩溃倒塌的实质。诗人曾亲身经历过历时十年的黄巢农民大起义，尽管由于他的阶级偏见和对唐王朝的愚忠而反对这次起义，所以曾在有的作品里，对农民的革命行动进行过诬蔑与攻击，这是应当加以批判的；但是，他的不少诗篇，却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动人心魄的战争场面和战乱萧条的残破图景，相当形象地补充了历史记载的缺佚。比如《辛丑年》：

九衢漂杵已成川，塞上黄云战马闲。

但有羸兵填渭水，更无奇士出商山。

田园已没红尘里，弟妹相逢白刃间。

西望翠华殊未返，泪痕空湿剑文斑。

诗人从大处落笔，不仅写出了“九衢漂杵”的战争场面和“田园没于红尘”，“弟妹逢于白刃”的动乱情景，而且从“战马放闲”、“羸兵填水”的描写中，慨叹朝中无人，在客观上暴露了唐王朝虚弱腐朽的本质。至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诗人所作的叙事长诗《秦妇吟》，虽然迄今为止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尚有争议，但此诗在当时业已家传户诵，颇有名气。以至韦庄本人也被“时人号‘《秦妇吟》秀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这首诗是假托一个被起义军俘虏的少妇的自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以及同“官军”反复争夺“皇都”的经过；描述了长安城经过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这次生死较量后所呈现的萧条破败景象；同时也较为真实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在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一败涂地的虚弱本质。因此，这首诗是韦庄采取史笔和诗情相结合的手法，描绘出来的晚唐历史画卷。它帮助我们形象地了解唐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情况、攻占长安的经过以及晚唐社会的黑暗衰败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韦庄的诗，还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如前所述，由于长期避乱流亡，使韦庄同下层人民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所以他也作过一些同情人民的诗篇。比如诗人在《秦妇吟》中就刻画了一个劳动者形象的老翁：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

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

.....

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支颐仰天哭。

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

.....